

# 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

## ——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陈春声

1991年以来,由于参加“华南社会史研究计划”,作者在韩江三角洲北缘的著名古港——樟林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sup>\*</sup>在当地文化、博物部门和文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蒐集到一批有价值的民间文献,其中有一部题为“樟林游火帝歌”的潮州歌册抄本。结合对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的分析,我们认为这部歌册的内容,包含了丰富的线索,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中外学者已有颇多研究<sup>①</sup>的社区的内部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的理解。现简单介绍如下。

### 一、潮州歌册与《樟林游火帝歌》

潮州歌册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一般认为它与弹词有

---

\* “华南社会史研究计划”的主持人为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陈其南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副教授参加了在樟林的大部分田野调查工作,本文许多观点和思路的形成得益于与他的多次深入讨论。家父文惠先生多年来协助搜集有关地方史料,并多次陪同下乡调查,使作者得以顺利进入所调查的社区。樟林当地的李绍雄、蓝春荣先生提供了许多资料和大量方便。参加该计划实地考察的陈支平、罗一星、蔡志祥、魏捷兹等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本文部分内容曾提交1993年1月香港科技大学举行之“民间文献与华南地域社会研讨会”,此次修改发表得益于廖迪生先生的评论和与会者的批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明显的渊源关系，还有人将其与唐代的变文联系起来<sup>②</sup>。其句法基本为七字句，每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押潮州话的平韵，第一句字韵，第二、四句协韵，第三句为仄声。歌词行文至高潮时，可夹上一段四字句、五字句、三字句、或三三七、三三四、三三五的句法，常押仄声韵<sup>③</sup>。

歌册的作者一般为地方上的下层文人或粗通文墨者，如教书先生、闲散市民、帐房先生和潮剧艺人等，俗称“无路秀才”或“半秀才”。说唱者和听众绝大多数是家庭妇女和儿童，没有职业说唱者，一般在绣花场、抽纱场、或庭前院内，一个人看着本子唱，其余的人边听边做手工活。歌册的语言基本上是潮州话的日常口语（如“做咩”、“乞你”、“地人”）和口头俗语（如“七嘴八舌”、“食大赔细”），少数文言也是潮剧戏台上的常用语。情节布局比较单纯，线路分明，所以识字不多的妇女易听易记，颇受欢迎。笔者孩提时代也常在夏天的夜晚，听聚集在“外埕”（院子）的邻居婶婆们唱歌册。

歌册的内容大多取材于戏剧、小说、弹词等，也有一部分是根据地方民间传说、故事改编而成，或描写地方的风土人情的。

清代咸丰年间，潮州府城的李万利杂货店率先木刻印刷潮州歌册，以后其第二代万利老店、万利春记和其它商号如王生记、万利生记（万得和王生记合店）、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瑞元堂、瑞经堂、五福堂、友文堂、王友芝堂等都营印歌册<sup>④</sup>。这些潮州城印的“府城歌册”在民间颇受珍视，有点门风之家常常在嫁女时随嫁妆送上一两部。许多歌册往往传了好几代人<sup>⑤</sup>。刊刻的潮州歌册的数量已不可考，不过，仅李万利一家，至民国时已印有木刻本五、六百种<sup>⑥</sup>。本世纪50年代，澄海县文化馆收藏的歌册也有300多部<sup>⑦</sup>。郭马风先生《旧潮州歌册调查杂

记》所附“旧潮州歌册版本初步调查目录”，录有他60年代初在汕头、潮安、澄海等地调查时翻阅、寻访到的歌册221种。谭正璧、谭寻1982年出版的《木鱼歌潮州歌叙录》载有他们在上海、广州两地古旧书店所见的潮州歌册162种，其中有16种是郭氏文章中所未提到的。近年汕头市群众艺术馆又重新誊印潮州歌册130多种。

除了书坊、商号刊刻的以外，许多地方还有传抄的歌册流行。这些未付梓的作品往往不太规范，文学色彩相对较弱，但对地方社会的描写更为直接、生动。《樟林游火帝歌》就属于这类歌册。

《游火帝歌》是1987年在编辑《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广东卷》“澄海县资料本”的过程中，由樟林当地的文史研究者李绍雄先生采集的，原抄本藏于当地一个退休干部家中。《游火帝歌》开首八句：

光绪登基国太平，十八省内俱中兴，  
正是国泰民安乐，风调雨顺好年情。  
自同传古及至今，情叙多端难尽陈，  
别州府县不必唱，单唱澄海人知因。

表明歌册写于清末光绪年间。作者署名为“清闲”，其真名实姓和生平已不可考，但从这个署名及歌册的内容推断，亦应为“无路秀才”一类的人物。《游火帝歌》有唱词698行，中间还抄入约400字的游火帝“引路牌”内容，共约5300字。《游火帝歌》在形式上不太规范，未严格遵守四句一韵的惯例，夹杂了大量的两句一韵、三句一韵或五句一韵的情况。由于是抄本，这种情形也可能是传抄过程中形成的。

《游火帝歌》以樟林埠的主神——火神巡游为主线，记叙了清代樟林内部街区布局、市场情况、地方权力体系、对外贸易、

民间戏曲、民风民俗等等方面的内容。

## 二、六社八街与火帝庙的建立

韩江三角洲平原是由于韩江带来的泥沙淤积，于 6000 年前开始形成的，至今平原仍在发育。平原形成过程中韩江不断分汊，最后分 19 口从澄海县入海<sup>⑧</sup>。韩江最北面的支流即为北溪，北溪入海口与三角洲北缘的莲花山之间有条宽 2—3 公里的狭长冲积带，成为三角洲往东北方向进入福建省的必经之地，明清两代广东通往福建的驿路从这里经过，民国时汕（头）樟（林）公路和（潮）安黄（岗）公路亦在此地交汇<sup>⑨</sup>。樟林就位于这个交汇点上，北依莲花山，南扼北溪口。

清代中期以后，樟林人在描述本地的内部地域关系时，习惯上采用“六社八街”的说法，正如《游火帝歌》所述：

澄海管落樟林乡，乡中宽阔实非常，  
共有六社八街路，行口铺户极多间。

本文所附地图反映了民国初年樟林的街区情形。可见所谓“八街”是指自北向南从村子中间流过的小河两边的 8 个商业街区，即地图中以黑色表示的街道。小河下游的水道折向东方汇入大海，这段东西向的水道为著名的樟林港，涨潮时海水可达仙桥街附近<sup>⑩</sup>。西、南边缘被小河和港口围绕的地区以一个城寨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 4 社。樟林港正好位于南社边上，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南社港”。小河的西边有一个大水塘，以其为界，北为仙垄社，南为塘西社。“南社港”以南的新兴街形成年代较晚，习惯上讲“六社八街”时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从文献记载和口头传说中，可知“六社八街”格局的形成经历了约 200 年的时间。

根据 1981 年 8 月在当地发现的“建寨呈文”、“抄录呈明府

主沟河界址”、“古迹大观”等一批文献<sup>①</sup>，可知樟林作为一个聚落，是明代嘉靖三十五年由原散居在莲花山边的 15 姓居民（主要是渔民或蛋户）筑寨居住而形成的。万历二十五年，樟林分为东、西、南、北 4 社。同年，村子西南方向隔河相望的地方开始有人居住，是为“塘西村”。乾隆八年以后，村子西北方向河对岸的荒丘上亦有人定居，这就是后来的仙垄社。东、西、南、北 4 社和塘西、仙垄都有自己的社神，西社拜祭玄天上帝（北帝），北社祭祀七圣夫人，其它 4 社的社神都是三山国王<sup>②</sup>。直至乾隆初年，现在的“樟林”仍然分为“樟林”（即东、西、南、北 4 社）、“塘西”、“仙垄”三个聚落。这个社区在地域上的整合，是随着“南社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八街”的兴起而形成的。

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在大多数时间里，海上贸易是政府所不允许的。当时潮州府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主要集中在荒僻的南澳岛和饶平县柘林港两处。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随着海上贸易的合法化，地处韩江入海口河海交汇之处，有最便捷的水路直通潮州府城<sup>③</sup>，并与韩江三角洲各地有河网沟通的樟林，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粤东最大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乾隆六年广东巡抚王安国密谕署粤海关监督“劝谕各商贩余米谷入口发卖”。次年奉旨免征米谷税银，使商民运米入口尤为踊跃<sup>④</sup>。乾隆二十年定广东商民运米回粤议叙条例，依数量多寡，生监可获吏目至县丞的职衔，民人可得九品至七品顶带<sup>⑤</sup>。这些规定无疑对樟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嘉庆年间任澄海知县的尹佩绅的说法，樟林港的米粮输入在解决当时缺粮严重的潮州地区的民食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⑥</sup>。乾隆三十二年运米回粤而被议叙的 9 名商人中，有 7 位是澄海县民<sup>⑦</sup>。在樟林港从事贸易活动的就是著名的“红头船”，1971 年和 1972 年，在

樟林附近的河滩出土了两艘清代红头船，其中一艘还刻有“广东省潮州府领□双桅壹佰肆拾伍号蔡万利商船”字样。<sup>18</sup>。时过境迁，现在可考的红头船商号和船名已为数不多，有意思的是，《游火帝歌》保留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此是闲文说不完，唱出人物恁知端，  
男女约有五十万，金顶色顶数十员。  
举贡生员甚是多，尚书达士也委无，  
积祖富贵也不少，发有洋船数十号。  
姓陈发只恩隆城，一号痒发更才能，  
姓杨一号叫和裕，姓洪万昌愈更兴。  
姓许有只美芝公，发有三号更威风，  
一号叫做万合发，二号叫做万合隆，  
三号叫做万合成，瓜册合爷更才情，  
一号行洋叫福顺，一号玉顺走太升。

歌中提到的商号和船名的详细情况，仍有待继续调查。但樟林当地目前还流行一句很粗俗的口语，从中也知道有条红头船名为“万昌”的<sup>19</sup>。

关于清代樟林作为海上贸易港口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要提到的是，乾隆年间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樟林、塘西、仙垄中间的水道两旁兴建了八个商业街区，使这三个原不相接的聚落在地域上连在一起，改变了整个社区的格局，形成现在的樟林埠。根据乾隆五十六年所立《樟林扩埠碑记》<sup>20</sup>所载：

乾隆七年，奉前县宪杨给示，招民户将樟林沟两旁沟  
淤荒地许民首建盖铺，东西两共计建铺一百零二间。后接  
盖小木板，下面河沟沟水疏通灌溉。每年输纳官租，迄今  
四十九载，历输无异。

可知“八街”兴起是乾隆七年以后，即清政府开始鼓励本国商人从暹罗等地运米回粤之后的事情。所谓“八街”是指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仙园等8个街区，嘉庆以后虽建新兴、元通二街，而大塘桥以南一段官路（铺仔前街）也发展起商业铺号，但习惯上人们只称“八街”。而且旧八街的地位要明显高于后起的街区，这一点在稍后关于游火帝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八街”之中，又以仙桥、长发二街最盛。当地人有“金仙桥，银长发”的说法。《游火帝歌》描述了八街商业贸易的情形：

只等按下不必言，唱出八街人知端，  
第一有钱长发厂，第二有钱永兴街，  
枯行豆行全整齐。第三就是西门外，  
西门一厂人俱闲，厂名叫做古新街。  
第四仙桥近涵头，高楼茶居也都齐。  
第五就是洽兴街，洋货交易在外畔。  
第六顺兴多洋行，也有当铺甲糖房。  
第七广盛销海味，亦有扣船共牵罾。  
第八仙园四角街，酒坊药行也大间。

这段叙述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传统贸易口岸内部商业街区的分布及其贸易情形。同类型的材料目前还不多见。

随着“八街”兴起，社区在地域上整合为一个大的有明显商业色彩的聚落，民间宗教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整个樟林埠的主神——火帝崇拜的开始。关于这个变化，《游火帝歌》记述了一个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的传说：

余下船名记不完，唱出神事人知端，  
马路尾个火帝庙，神灵显赫不虚传。

乃是乾隆三年间，二甲出身杨老爷，  
到任来做澄海县，遇逢拜客樟林行。  
杨爷地理精万千，路游直入长发街，  
举首一望直过箭，顺途游过马路前。  
吩咐住轿出门来，抬头一看心内知，  
当面山形成火局，火煞迫近免疑猜。  
此街生成一烟筒，冬天一到火自红，  
不时定然遭火祸，为何无人识行藏？  
当时上轿游入城，直入武庙关爷厅，  
和尚闻知来迎接，接入县主到大厅。  
杨爷下礼拜神明，和尚擂鼓共敲钟，  
拜毕进入后堂来，和尚进茶不迟停。  
樟林司爷一闻知，慌张也到武庙来，  
六社乡绅也尽到，礼毕坐下言东西。  
杨爷开口说一声，本县路过大街行，  
我观此街生火煞，切须料理快施行。  
众人听着喜冲天，大人明见无差迟，  
正是年年遭火难，一年一次真惨凄。  
大人有也可安排，好来示阮众人知，  
为民保得平安福，感戴大人恩万千。  
杨爷开口再说言，若欲调理不艰难，  
市嘴建个火帝庙，可保合埠稳平安。  
杨爷说罢就起行，摆道回返澄海城，  
众人听伊就料理，择日兴工庙建成。

.....

自此埠中愈中兴，俱知杨爷个恩情，  
不觉杨爷登仙界，刻伊禄位请入宫。

造字以为天德爷，每年神游出来营，  
开摆排有四抬轿，铜锣十三贡贡声。  
这等福分本非轻，杨爷平生行好心，  
今日正有障如此，香名给人传古今。

这个传说有两个地方是有疑问的：第一，歌册中写明讲杨老爷游长发街和倡建火帝庙的时间为乾隆三年，但从前引《樟林扩埠碑记》可知，位于樟林沟西边的长发街是乾隆七年才开始形成的；第二，查乾隆以后的《澄海县志》，其中并无一位叫“杨天德”的知县。从《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中，知道雍正庚戌科云南楚雄县出有一位叫杨天德的进士，列三甲第二一四名，亦非歌册中所讲的“二甲”。嘉庆《楚雄县志》载其出任过广东顺德知县，而广东的几部县志表明，他乾隆八年任封川知县，十一年任保昌知县，十四年调署琼山知县，十六年又回到保昌任上<sup>①</sup>。在所有的官方文献中，找不到这个叫杨天德的人出任澄海知县的记载。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否真有杨天德其人其事本来是不重要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当地人在知道上述的疑点后，仍然坚持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他们的解释是，可能《游火帝歌》的作者把时间搞错了，建火帝庙应在乾隆八年<sup>②</sup>，而“杨天德任封川知县之前在广东候补过一段时间，乾隆七年短期署理过澄海知县。……或因署理时间过短而县志不载。”<sup>③</sup>

以杨天德为中心的这个故事，渲染的重点在于杨天德的身份和有份参与建庙决定的各色人等的地位。我们发现在这个传说中，知县、樟林巡检司和六社乡绅都参加了决定的过程（实际上还有绿营——众所周知，议事的关帝庙是驻守樟林寨内的南澳镇澄海协右营守备官兵祭祀的庙宇<sup>④</sup>）。这不但赋予火帝崇

拜以正统性的色彩，而且暗示着火帝庙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得到地方上最有势力者的承认。那么，实际上真正有份建设和管理火帝庙，并可能大力渲染这一传说的是什么人呢？从火帝庙建于八街街口，传说中建庙的直接动因在于防止商铺的火灾这两点已可推想，火帝庙最初可能是八街商人的庙宇。后来它成为樟林全乡的主神，成为整个社区中唯一可以游遍全乡的神明，或许反映了海上贸易发展过程中，商人在这个港口市镇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以下对火帝巡游的讨论可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关于杨天德的故事和游火帝时以全套知县执事抬着杨天德牌位开道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清代实际上是违制的），为火帝的主神地位提供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上的合理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与其去考究“杨天德”是否真有其人，还不如直接从“天德”二字的辞语学含义去理解这个传说更接近实际一些。

### 三、火帝巡游与社区地域关系

火帝巡游是《游火帝歌》描述的主要内容。火帝巡游的活动从每年二月初一开始，至二月十五游神正日结束，历时半个月。在此期间，游神成为整个樟林埠压倒一切的公共事务，社区内部地域关系的方方面面，在一系列的仪式上得到充分展现<sup>②</sup>。

二月初一至十四的主要活动是以“八街”为中心的“坐厂”。《游火帝歌》这样描述“坐厂”的情形：

再唱神游人知因，二月十五庆神游，  
自从起基年年有，闹热半月事非轻。  
二月初一一到来，人客入埠闹猜猜，  
走仔媳妇尽都到，姑娘舅妯也都来。

.....

三餐桌席来奉承，夜来同去看花灯，  
又有涂戏共革戏，八个神厂赛月宫。  
八街尽盖挽天来，街吊灯橱共灯牌，  
纱灯活灯柴头景，龙虎狮象做一排。  
行店各自彩铺前，门口吊有灯橱畔，  
两旁对联贴雅雅，又吊鲤鱼汶水笑。  
亦有古玩走马灯，青景奇花样样清，  
彩有飞禽共走兽，亦有海味绣球灯。

所谓“坐厂”就是在神庙之外设置临时的“神厂”，把神明请到“神厂”安放并供人拜祭的仪式。从二月初一开始，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仙园等八街各设一厂，分别摆放火帝、夫人和6位太子的神像，其中摆放火帝和杨天德牌位的一厂为“大厂”，余称“子厂”。“大厂”和“子厂”按顺序在各街轮流设立，每个街区8年有一次设大厂的机会。按民间的传说，神明“坐厂”带有巡视治境和保佑地方平安的意思，火帝“坐厂”严格限制在“八街”的范围内轮流，说明他确实是“八街”的神。而且除了帝君、夫人，刚好有6位太子，正好一街一厂，也不能不是有意识的安排。

对于在商业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八街”来说，“坐厂”提供了充分展示其经济力量的机会。正月下旬起八个街区的上空已全部盖上蓝白相间的长大布条，以遮阳光及防春雨。即《游火帝歌》所称之“挽天”。“神厂”设在商铺里边，被选中的铺号要歇业半月。“大厂”一般要占两个铺面。“神厂”以榕树枝叶扎成彩门，门口挂上灯橱和各种灯饰，厂内布置典雅，摆放着桑枝桌椅、醉翁椅、花几、名人字画、盆景等等，入夜还请有清音小锣鼓，奏乐配唱，各厂陈放的花灯大多是从府城定购的。

“坐厂”和巡游的费用完全由八街上的商号捐题，不向一般民户摊派。“大厂”的开销颇巨，故各街每年都节余下一些钱准备8年一次当值“大厂”时用。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火帝坐厂长达半个月，实际上是八街的商人想多赚钱的一种安排。樟林的火帝巡游在周围地区遐迩闻名，澄海、海阳、饶平、南澳和闽南诏安各县的人，都有专门来樟林看游神和花灯的，如《游火帝歌》所述：

白字西秦共外江，共凑约有廿外班，  
连做四夜共四日，引动邻近外乡人。  
其中来者外海客，海山浮任后宅江，  
南澳斗门云盖寺，尽来得跔兼看人。  
过海之人爱风骚，头毛赤赤目汁流，  
辫后编条红棕索，染薯裤坐赤衫头。  
山内出来多过虾，内寨卓花黄山坑，  
坎下雨亭甲官渡，洪厝埔内人更加。  
溪西隆城十五乡，南溪龙头加西洋。  
埭头岱美溪畔势，东陇水寨西陇乡。  
澄城蓬阳尽都来，百号人物谁都知道，  
男妇老幼过热闹，青盲腰龟也到来。

这些人在樟林的亲戚朋友中一住半月，每天上街观灯、看戏、听曲，无疑会使八街的商店多做生意。还有，火帝忌水，而农历二月十五往往已届春雨时节，游神时如遇雨就必须顺延，叫“挨日”。有时一挨十天半月，令家里住满亲戚的人家叫苦不迭：

亲情来到一大堆，可比一群蛀米龟，  
城市之人爱脸面，剖鸡杀鸭掠池鱼。

所以，当地人常常无可奈何地抱怨，“挨日”的惯例也是八街商人想出来的鬼主意。近几十年已无外乡人云集樟林看游神之事，

但我们去调查时，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提到“挨日”及其与商人的关系。

二月十二，有一个“洗路”的仪式。一顶小竹轿抬着一个戏台上驿丞打扮的白鼻头“小老爹”，在仪仗的引导下沿火帝将巡游路线，巡查一遍，含净道之意。

二月十三称为“分标”日，由巡检司署向八厂的队伍分发“标仔”（详后）。

二月十四的活动是“营古亭”，如《游火帝歌》所述：

十四名为营古亭，分做八厂各游行，  
六社八街俱营透，然后坐厂各回程。

“营”是潮州话的谐音字，这个音作为动词时，表示一种“在行进中展示”的意义。“古亭”是一座木制的精致小亭，称为“蓬莱佳境”，由四人用木杠肩抬。后面跟着两人扛的香案，插上若干烧点着的香枝，游行六社八街，所到之处，人们争相换香，带回家中，以祈平安。

二月十五是游神正日，《游火帝歌》这样描述游神的队伍：

大厂执事全摆齐，路牌引道在头前，  
放起三个宣天炮，子厂起行走头先。  
大厂在后也起程，执事摆行也分明，  
一百对縹丝绶缎，縹前彩对绣球灯。  
摆有八对企脚牌，执事八宝共金狮，  
百枝纷花雨伞仔，八音数班闹猜猜。  
也有高灯共彩旗，吹着一路唱曲诗。  
小锣鼓仔十外班，亦有童子歌曲言，  
古亭彩得蓬莱阁，扛景压到面红红。  
天德老爷轿四抬，前面数对虎头牌，  
杀首四名两畔摆，铜钦十三扣人知。

八座香亭世无双，四面花鸟照见人，  
八仙过海真正雅，双龙抢宝在镇中。  
廿匹马景更好看，扒做戏出人知端，  
孩童趣味得人惜，请来扮景给人观。  
八个扛神戴红缨，身穿红袄有分明，  
脚穿花鞋手持扇，水晶眼镜挂眼睛。  
大班锣鼓十外班，各班皆有几十人，  
衣裳打扮各国色，编有大辩笑死人。  
锣声鼓乐闹喧天，各处迎神闹凄凄，  
乡绅耆老随圣驾，神人共欢乐尧天。

游神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游神的路线（叫“安路”），《游火帝歌》中录有清末的“引路牌”内容（详见资料），我们发现，近年的火帝巡游仍然按照这块引路牌开列的路线行进。细心分析这条“安路”就可看出，火帝巡游过程中“重八街、轻六社”的原则仍然在起作用。游神队伍至少经过八街的范围4次，走遍每一条街道（有的街道甚至两次经过），而在六社则只是从每社的中间一穿而过。

“安路”被安排从六社的每个社庙门前的外埕通过。但庙前的仪式或活动有很大差别，反映了各社及其社庙历史发展过程和在社区中地位的差异。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安路”七弯八拐地避开了西社“玄天上帝”庙前的一段路。玄天上帝（北帝）庙原为西社社庙，据说明代天启四年当地举人郑廷槐到北京参加会考时，就曾得到北帝庙的资助。现在庙门上有一石匾，刻着“雍正甲寅桐月之吉日”字样，也许这是其最后一次重修的记录。乾隆年间该庙仍香火很盛，《樟林扩埠碑记》记载，乾隆七年在樟林沟两旁盖建铺屋时，就有“郑允倍等十二间，地租向无输官，历纳元

天上帝、土地爷两庙香灯”，被称为“香灯铺”。乾隆五十六年还立碑再次强调这些香灯铺的地位，<sup>⑧</sup>说明当时北帝庙尚未衰落。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北帝庙已香火稀落，满目疮痍，早已失去西社社庙的地位。当地人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西社社神原为“七圣夫人”。明末樟林寨被一伙以“曾阿三”为首的海盗攻破<sup>⑨</sup>，西社冤死鬼太多，经常作乱，“七圣夫人”以女流之辈，过于懦弱，无力弹压，只好辞职到北社当社神。玄天上帝来此接任，把所有冤魂收起来压在自己座下，所以再也不能出门巡游。西社人为了能有一个可巡路的社神，就把原在村外山脚井仔泉地方的土地爷（感天大帝）请到村内为他修了一个行宫，开始时只是巡游那几天才摆在宫内，后来干脆不再送回井仔泉旧庙。这样，“感天大帝庙”就逐渐取代“玄天上帝庙”成为西社的社庙。我们觉得，北帝庙的衰落与火帝庙的兴起可能有较大关系。北帝属水，与火帝相克，而火帝庙又位于西社之内，与北帝庙隔河相望。这样，他们巡游时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特别是火帝成为全乡主神后，每次巡游一定要经过各社社庙，而北帝庙门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去的，结果就只能是北帝庙丧失其社神地位。所以，与北帝有关的禁忌和北帝庙的衰落，实际上反映了商业街区与原来的农业社区、商人与一般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彼此力量的消长。

另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是，二月十五早上各厂把神像抬到塘西国王庙前集中，由此出发开始一天的巡游。塘西社的长老要摆香案跪送“圣驾”，并准备一台戏（潮剧或外江戏）昼夜演出。《游火帝歌》载：

闲话不必去唱伊，今日就是十五天，  
辰时出游起圣驾，巳时上马无延迟。  
号统一响合埠知，八厂各各俱安排。

齐到塘西来集会，八厂齐齐做一排。

塘西国王庙前的仪式，反映了塘西社在整个社区的特殊地位。如前所述，乾隆初年以前，塘西一直是樟林西面一条独立发展的“村”。“八街”兴起后，塘西在地理上与樟林连成一片，逐渐被整合为“樟林埠”的“六社”之一。但嘉庆《澄海县志》仍把“塘西”与“樟林”并列为两条村<sup>⑧</sup>，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官府看来，塘西仍然是一个独立于樟林的行政单位。也许正是这种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塘西的国王庙取得一种可与南社的山海雄镇庙（详后）相抗衡的地位，使一年一度的火帝巡游要在它门前（而不是火帝庙门前）开始。

南社的三山国王庙（山海雄镇庙）是火帝唯一在“八街”外“坐厂”并供人祭拜的地位。南社提前在此搭了高大的安放神轿的棚子（即“厂”），供游神队伍中午吃饭时安置神像。“神厂”之前摆有许多祭台，供乡人摆放供品拜祭之用。“神厂”对面同样搭有戏棚，连演几天大戏。二月十五中午吃饭时，这里热闹非凡，成为一个祭拜的中心。我们1992年初在当地参加游神活动时，曾多次问有份抬神轿的人，为什么中午火帝要在南社宫前坐厂，得到的回答都是：“南社宫国王很大，全乡有份，所以火帝要在这里停一停”。樟林建寨30年后，即万历十四年，山海雄镇庙就已建立，并成为全村的主庙。万历二十五年樟林分东、西、南、北4社，它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了南社的社庙，另一方面又仍然是樟林乡最“大”的庙，是全乡都有“份”的。南社宫的三山国王坐厂和巡游时，全乡人都来祭拜。每年全乡各家各户门楣上都会换贴一张盖着“山海雄镇”四字的神符，保佑平安。据说该庙的药签甚为灵验，村里人病了，都可来此求签，按签号向庙祝易取药方，就可到药铺取药治病。<sup>⑨</sup>火帝庙建立前，山海雄镇庙在社区中拥有最高

的地位和最大的影响力。所以，火帝巡游时到此“坐厂”决不是偶然的。

#### 四、《游火帝歌》所见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除了“六社八街”之外，清代樟林内部尚有一个特殊的地域，就是东、西、南、北四社中央由石寨墙环绕的城寨。《游火帝歌》这样描述城寨的内部情形：

中央建有一座城，城内设有三官厅。  
内间分司左副府，一座宽阔文帝祠，  
理事就是陈老师。南门一座武帝庙，  
庙内并无人混杂，俱是僧人在居住。

所谓“三官厅”，即樟林巡检司、守备署和汛署，而文帝祠和武帝庙也是分别属于巡检司、守备署的庙宇。从地图还可看出，城寨中尚有驿塘（急递铺）、城隍庙等官方的机构或庙宇。《游火帝歌》以较多篇幅叙述火帝巡游时城寨中官员们和军人的所作所为，从中可看出社区内部官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已故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业师傅衣凌教授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中，“乡绅”阶层在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按照他的观点，“乡绅”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

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这是‘乡绅’阶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sup>⑩</sup>

从《游火帝歌》可以看出，实际控制樟林社会的，也是这样一群乡绅：

埠中虽是杂姓人，并无相欺西共东，  
不论士农工商客，合埠俱是乡里人。  
六社俱有大乡绅，照理按束人士商，  
如是做事不合理，拿送司爷办伊身。  
第一大粒西社陈，雄恩太公是伊人。  
第二就是仙陇社，职居世袭名麦爷。  
三等北社黄伯太，四等炎太塘西社。  
五等南社秋老师，六等东社让秀才。  
乡绅个个好名声，理事公道无乱行，  
商士不敢妄法做，合埠和顺免惊营。

近年笔者在樟林调查时，一直试图弄清《游火帝歌》所讲的这些乡绅的具体情况，但因年代久远，已无人可以讲清。不过，从这段歌文仍可看出，乡绅们在社区中被期待的角色是“理事公道”和“照理按束人士商”，而且是由他们把“做事不合理”的乡人“拿送司爷”的，其影响力和权威可见一斑。

乡绅们在火帝巡游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前述有关火帝庙来历的传说中，杨天德就是向“樟林司爷”和“六社乡绅”建议“市嘴建个火帝庙”的，由这一情节亦可了解乡民观念中乡绅的地位。二月十五日游神正日，乡绅们是伴随在“圣驾”左右参加巡游的：

锣声鼓乐闹喧天，各处迎神闹凄凄，  
乡绅耆老随圣驾，神人共欢乐尧天。

在游神这类带有强烈象征色彩的仪式中，伴随圣驾自然是一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不过，对于“六社乡绅”与“八街商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考察的问题。

作为社区内部最重要的官方机构，樟林巡检司署也象征性地参与了游神的活动，这就是二月十三日的“分标”。

灯今看完归回家，各各回返心头青，  
不觉过了十数日，二月十三分标夜。  
司爷阿奶爱看灯，打有银牌点双龙，  
红缙做缙为灯赏，衙内彩得十分清。  
火灯钞灯入城来，亚奶看了赏银牌，  
八音锣鼓赏缙仔，八厂得赏笑唠咳。

这个分标的仪式，具有多重的意义。首先，尽管火帝是清代官方认可的神明，但樟林火帝庙绝对是一个民间的庙宇，地方官员从未在此举行过任何官式的祀典。虽然“分标夜”各厂抬入城寨领赏的是花灯，而不是神像，但作为整个游神活动的一部分，“分标”这一行为可给整个活动带上某种“正统性”的色彩；其次，在樟林那么多神庙的活动中，唯有火帝巡游有官员的正式参与。如果说在传说中把火帝庙的来历与杨天德这位可能是虚拟的知县拉在一起，使该庙作为全乡主庙的地位有了文化上的证据的话，那么，巡检司爷、司奶仅为参加火帝巡游的八厂队伍分标这一事实，就可视为火帝庙主庙地位明确而实用的政治标志；又次，在正式的巡游开始之前，八社花灯、花旗队伍特意先到城寨中为巡检司署表演、展示这一事实，强调了实际发挥基层政权职能的巡检司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而从二月初司署即已张灯结彩，“分标夜”司爷、司奶亲自颁发“银牌”、“标仔”（小旗）等活动，又可视为地方政权“与民同乐”，协调与百姓关系的一种姿态。

就笔者所知，巡检司等基层官员参与民间庙宇的游神活动，并成为定例的情况，并不多见。樟林巡检司的做法，也许与当时樟林已成为澄海县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地这一事实有关。

康熙三年迁界之前，樟林和塘西地方并无任何官方的机构，

樟林居民隶属于东陇河泊所管辖<sup>⑧</sup>。康熙八年奉旨迁民归复开耕，同年迁东陇河泊所署于樟林<sup>⑨</sup>，樟林始有官方行政机构之设。雍正九年应广东总督郝玉麟之请，“裁广东澄海县东垄河泊所大使缺，改设樟林镇巡检一员。”<sup>⑩</sup>按规定，巡检“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sup>⑪</sup>就笔者看到的材料，巡检司还参与社会管理，赋税催征、狱讼调处等等事务，实际上是次于县的一级行政机构。樟林巡检司是当时澄海县的两个巡检司之一，其管辖范围并不限于樟林本乡，而是包括了苏湾都北部的大片地区。

康熙八年复界时，两广总督周有德颁发《安定柘林、樟林、南洋汛地兵营牌》，确定在樟林建立兵营，安置官兵防守<sup>⑫</sup>。是年署澄海知县闫奇英修建东、西、南、北四社中央的城寨，周围一百四千丈，高一丈四尺。<sup>⑬</sup>城内设右营守备署<sup>⑭</sup>和樟林母汛。乾隆年间守备署有马、步兵 660 人，营房七十四间，专辖澄海县沿海地区的水陆汛地 18 处。樟林汛为右营守备下辖的 6 个母汛之一，有营房 9 间，汛兵 24 名，并辖苏湾都北部的东陇、鸿沟、盐灶、九溪桥 4 汛。<sup>⑮</sup>

由于这种地域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地的地位，官员在这个港口乡镇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许这种情况使政府和民间社会两方面都感到基层官员适当参与民间大型节庆活动的必要。

有意思的是，与对司爷的恭敬态度不同，《游火帝歌》表达了一种歧视、对抗兵丁的情绪，唯一一段提到汛兵的歌文，居然是指责他们与恶棍串通，设局诱赌，坑害良民的：

一种叫做啄虎须，三支竹子滑溜溜，  
一支带有红丝线，压着赔钱全无抽。  
虽然百钱对百钱，其中总是有藏弊，

内中十人伊居九，任尔单人难赢伊。  
但到只班张食人，三群四党合一班，  
借有号衣穿身上，乌裘叠面假闲人。  
人人拿着闹猜猜，你若挽着伊就来，  
口说欲辍手拖丢，伊洗火炭你唔知。  
不若挽着伊假痴，你必欲伊来赔钱，  
拳头对面就擦去，打了倒但你打伊。  
有人乌裘企一边，勇士出现穿号衣，  
将伊伙记就掠去，等你辍去打官司。

其实，这种与兵丁对抗的心理，从康熙八年右营守备署设立时就开始了。当时人是这样看待军队进入本社区驻防的：

康熙八年己酉许海内之民归复开耕，即于是年议设营  
塹于东陇渡头榕脚。因乡乏人理事，被究棍攒来俺乡中筑  
防。周一百四十丈，高一丈四尺，置三门，设守备一员，兵  
五百名以御卫，从来设兵以卫民，今且民以卫兵，噫怪矣  
哉！<sup>④</sup>

不满、排斥的心态跃然纸上。本社区成为商业中心以后，商人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十分尖锐，嘉庆年间曾在樟林任塾师的本县人黄蟾桂，就记载了一些海盗抢掠商船，汛兵坐视不理，反责怪逃命的商人纵盗的事实。<sup>④</sup>

## 五、余论：潮州歌册之社会史资料价值

稍为翻阅《樟林游火帝歌》全文，就会发现，本文引述的只是歌册的部分内容。因篇幅关系，我们对《游火帝歌》所反映的樟林与周围社区的关系、宗教活动与地方戏曲（特别是潮剧）发展的关系、以及许多有关风土人情的资料，都未能展开讨论。尽管如此，以上的讨论仍可说明，过去长期被史学家们

忽视的潮州歌册，是研究潮州地域历史发展的宝贵资料。

国际社会史研究的现代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就是日益重视民间地域社会，重视民间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从书信、账本、日记、民间传说、戏曲剧本等等材料中，揭示百姓日常生活、基层权力结构与社区关系、普通人的心态和行为伦理等社会生活内容，正成为对新一代社会史学家越来越有魅力的学术课题，并已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问世。对潮州歌册的发掘和利用，无疑是符合这一学术发展趋势的。

《樟林游火帝歌》属于当地人记当地事的作品，在其流传的年代，每年都有游火帝的仪式举行，乡间妇女传唱时，自然有足够的经验知识来检验其内容的真实性，所以本文基本上是将其作为可信的史料来利用的。在潮州民间，这类未曾刊印的歌册抄本为数甚多，因为没有出版时的修饰整理，可能更多地保留了有关乡村基层实况的内容。如有机会把这些歌册抄本蒐集、整理出来，研究者们对传统潮州文化的了解一定会深刻许多。

就是已刊刻印刷的歌册中，也有许多是描述潮州地方的人物事件的，如《吴忠恕》、《刘进忠》、《枫溪械斗案》等等，<sup>②</sup>其中同样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潮州社会史资料。以《吴忠恕全歌》为例，尽管其中对吴忠恕之乱的过程有许多文学化的渲染，但仍然保留了大量在方志、笔记和其它史籍中不易获见的民间仪式、村际关系、官民关系、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如吴忠恕的军师对海阳、澄海二县地方情形的描述，就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清末该地区“乡族”关系的理解。

亮师闻问回音答，内洋一派之乡村，  
欲算庵埠上有钱，庵埠一得有主施，  
陈杨二姓皆古富，欲勒谁人敢不依。  
若是不听报言因，许一过去就踏沉，

有钱谁人俱畏事，必着赠报之白金。  
陈杨王林一相听，下畔还有月浦余，  
渔洲陈蔡共吴李，南面不远蓬洲城。  
鸥汀背乡不相离，东畔官袋共洋边，  
浮陇落去浮陇尾，沙尾东墩近海墘。

即使那些不以潮州人物、事件为描述对象的歌册，也可成为潮州文化研究的资料依据。因为这些潮册大多是潮州下层的读书人撰写和改编的，又在民间广为传唱，所以，其反映的价值观念，包括行为伦理、关于国家政权的看法、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等等，必定是在民间得到广泛认同和共鸣的，更深层地表达了某种基层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许多歌册是从弹词、小说、传奇故事等改编而成的，若得将两者互相比较，一定可使人们对潮州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整体风貌，有更丰富的认识。

而另一方面，潮州歌册的读者和听众基本上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妇女和儿童。这些由读书人写出来的歌文实际上又有某种“文化传播”的作用，妇女们在潜移默化之中，不但由唱歌册而学会五、六百个常用汉字，而且也会受到一种带有读书人色彩的文化的感染。所以，对于妇女史的研究来说，潮州歌册也是一种难得的材料，潮州妇女文化所特有的风貌，也许与唱歌册这种习俗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对于儿童来说，从婴儿时代就开始耳闻目染，也容易接受歌册所宣扬的伦理准则和对历史、对人生、对社会的解释，歌册的广泛流传就有可能影响到潮州人从孩提时代就形成的“集体记忆”，从而具有某种“文化传承”的意义。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对潮州歌册的研究必可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

①本世纪30年代以来，对该社区已有许多有影响的研究。1934—1935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教授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主持有关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计划，樟林即为其重点研究的3个华侨社区之一（参见陈达《浪迹十年》，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页3—7）。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氏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引证的是樟林（即书中之“华侨社区丙”）的调查材料。参加这一调查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卢明和陈国梁除协助陈达搜查整理有关资料外，还于1936年出版了《樟林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出版），发表了陈著未收录的其它调查所得。近10年对樟林港研究成果最多的是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映秋教授，她多次率队到此地调查，已发表《樟林港埠与红头船》（《汕头文史》第8辑，页205—215）、《近代潮汕人民向外移殖及其对潮汕经济开发的影响》（《华人华侨历史论丛》，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81年版，页239—260）、《对广东澄海人迁移海外的观察与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页2—13）等一系列有深度的论文。樟林本地的文史研究者李绍雄先生也是对这一古港研究颇为深入的作者，著有《樟林沧桑录》（澄海县政协东里镇联络组、澄海县文联1990年印行）一书和《清代粤东“通洋总汇”——樟林港》（《澄海文史资料》第5辑，页13—19）、《樟林古港繁荣时期的几次浩劫》（《澄海县志通讯》1987年第3期，页17—18）、《粤东樟林古港二月花灯盛会纪要》（《汕头文史》第11辑，“潮汕文化丛拾”，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版，页207—217）等文章。此外，有关樟林的论著还有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8—19），叶显恩主编《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页224—225），段立生《澄海樟林港、红头船与潮属人民旅暹初探》（《华人华侨历史论丛》，页261—273），林远辉、张应龙《清代樟林港与早期潮汕人的出洋》（《侨史学报》1986年第3期）、《潮州樟林史略》（《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1993年第1期），黄光武《雍正潮州海盗、广东海防与红头船》（《澄海文史资料》第8辑，页15—19）和刘益《民初以来樟东一带金融点滴》（《澄海县志通讯》1989年第1期，页23—25）等。本文从以上的研究中获益良多。

②参见郭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载《广东出版史料》第二辑，广

- 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出版史料》编辑部 1991 年印，页 114—124；伯容《变文与歌册歌的价值》，《侨港潮汕文教联谊会会刊》第三期（1974 年 9 月），页 160。
- ③参见《澄海县文化志》，澄海县文化局 1988 年油印本，页 144—146。
- ④参见郭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薛汕整理《潮州歌册选集》（上、下册），汕头市群众艺术馆 1992 年编印；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版。
- ⑤陈觅、郭华《潮汕妇女与潮州歌册》，《国际潮讯》第十二期（1990 年 9 月），页 121—124。
- ⑥陈觅、郭华《潮汕妇女与潮州歌册》。
- ⑦《澄海县文化志》，页 44。
- ⑧由于 60 年代以后人工围海造田和并围堵口的工程，现在韩江只有 5 个入海口。
- ⑨汕樟公路和安黄公路东段为现在广（州）福（州）公路（国道 324 线）的一部分。
- ⑩这里描述的是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情况。在此之后由于围海造田，原樟林港已变成一段没有出海口的水道，逐渐淤积。近年由海外华侨捐款，准备疏浚这一水面，建设樟林古港公园。
- ⑪这些材料和同时发现的其它一批 17 至 18 世纪的樟林地方文献的抄件，以“樟林乡土史料”为题，作为专集收藏于澄海县博物馆。感谢该馆的大力支持，使作者得以利用这些重要资料。
- ⑫关于六社的历史及其社神崇拜的形成过程，可参见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⑬尽管韩江有 19 个入海口，但一般认为，由北溪口溯流而上，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仙美溪，进入东溪，上至潮州的水路，是从海上坐船到府城航程较短、通航条件最好的航线。
- ⑭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王安国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 年第 3 期。
- ⑮杨应琚《海洋运米商民酌请议叙疏》，乾隆《广州府志》卷五十三，艺文五。

- ⑩参见尹佩绅《凤山记序·拨充风伯庙祀祭香灯章程碑记》，道光七年刻本，面23—25。
- ⑪《明清史料》庚编，第8本，页736—738。有关清代潮州府缺粮和米粮进口的情况，可参见拙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35—44，52—56，59—62。
- ⑫参见《澄海县文物志》，1987年铅印本，页52—53。
- ⑬参见黄光武《万昌——从乡言口语知一红头船的商号》，《澄海文史资料》第三辑（1989年5月），页77。
- ⑭《澄海县文物志》，页135—136。
- ⑮参见嘉庆《楚雄县志》册7，人物；乾隆《保昌县志》卷8，职官；咸丰《琼山县志》卷13，职官。
- ⑯参见李绍雄《粤东古港樟林二月花灯盛会纪要》，《汕头文史》第十一辑，“潮汕文化丛拾”，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版，页207—217；《东里镇大事记（1743—1911）》，1989年油印本，页1。
- ⑰黄光武《云南进士 广东知县——杨天德生平简介》，《澄海文史资料》第9辑（1992年10月），页47—49。
- ⑱嘉庆《澄海县志》卷16，“祀典”载：“关帝庙，在樟林城堡南门内。康熙年间建。乾隆九年甲子右营守备谢英重修。嘉庆六年辛酉守备谢富、绅士陈先等重修。”
- ⑲本节关于游神活动的叙述，除了《游火帝歌》所述之外，主要根据1992年春我们在樟林实地参加游神活动的调查所得，并从李绍雄先生《粤东古港樟林二月花灯盛会纪要》一文获益良多。
- ⑳《澄海县文物志》，页135—136。
- ㉑“曾阿三打破樟林寨”在当地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大海盗曾阿三（曾耙头）活动于正统十一年（参见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页14—15），樟林要在110年后才建寨。
- ㉒嘉庆《澄海县志》卷8，都图，页3。
- ㉓参见现在山海雄镇庙前之《庙宇重光碑记》。
- ㉔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页245—246。
- ㉕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 ③②《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解疑》。
- ③③嘉庆《澄海县志》卷4，文署廨。
- ③④《清世宗实录》卷105，雍正九年四月戊戌。
- ③⑤《清史稿》卷116，职官志三。
- ③⑥《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解疑》。
- ③⑦乾隆《潮州府志》卷6，城池。
- ③⑧康熙二十三年右营守备署移住南洋，乾隆八年再迁回樟林，直到清末。
- ③⑨嘉庆《澄海县志》卷22，营汛。
- ④⑩《樟林乡土史料·上林氏记述》。
- ④⑪黄蟾桂《立雪山房文集·晏海渺论》。可参见拙作《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176—177。
- ④⑫有关目录可参见郭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

## 资 料

### 《樟林游火帝歌》（潮州歌册）

光绪登基国太平，十八省内俱中兴，正是国泰民安乐，风调雨顺好年情。自同传古及至今，情叙多端难尽陈，别州府县不必唱，单唱澄海人知因。澄海管落樟林乡，乡中宽阔实非常，共有六社八街路，行口铺户极多间。中央建有一座城，城内设有三官厅，内间分司左副府，一座宽阔文帝祠，理事就是陈老师。南门一座武帝庙，庙内并无人混杂，俱是僧人在居住。埠中虽是杂姓人，并无相欺西共东，不论士农工商客，合埠俱是乡里人。六社俱有大乡绅，照理按束人士商，如是做事不合理，拿送司爷办伊身。第一大粒西社陈，雄恩太公是伊人。第二就是仙陇社，职居世袭名麦爷。三等北社黄田太，四等炎太塘西社。五等南社秋老爷，六等东社让秀才。乡绅个个好名声，理事公道无乱行，商士不敢妄法做，合埠和顺免惊营。只等按下不必言，唱出八街人知端：第一有钱长发厂，第二有钱永兴街，米古行豆行全整齐。第三就是西门外，西门一厂人俱闲，厂名叫做古新街。

第四仙桥近涵头，高楼茶居也都齐。第五就是洽兴街，洋华交易在外畔。第六顺兴多洋行，也有当铺甲糖房。第七广盛销海味，亦有扣船共牵譬。第八仙园四角街，酒坊药行也大间。中股行过是马路，早市到来人万千。早时到市菜共羹，菠菜芹菜黄豆生，大菜白菜荷兰豆，冬瓜秋瓜共番瓜。茼蒿芜荑六茄蒜，粉菜馨菜格兰花，真珠蕞菜菜仔菜，菜头番茄吊瓜葱，青茄白茄甲粉豆，苋菜应菜斗大丛。芋头芋卵芋枝仔，蕃葛多种价不同；亦有番种英哥番，又有惠来鸡蛋红，文来双种白菜仔，大叶婆种双又馨，赤种花种在粪堆，乌叶白叶灰伙匏，贡种绝种甜果种，三廉婆种赤米龟。鸡鸭摆在栅门边，许个秤中无私偏，买卖尽着交伊秤，只鹅赚人四文钱。此是闲文说不完，唱出人物恁知端，男女约有五十万，金顶色顶数十员。举贡生员甚是多，尚书达士也委无，积祖富贵也委少，发有洋船数十号。姓陈发只恩隆城，一号痒发更才能，姓杨一号叫和裕，姓洪万昌愈更兴。姓许有只美芝公，发有三号更威风：一号叫做万合发，二号叫做万合隆，三号叫做万合成。瓜册命爷更才情，一号行洋叫福顺，一号玉顺走太升。余下船名记不完，唱出神事人知端：马路尾个火神庙，神灵显赫不虚传。乃是乾隆三年间，二甲出身杨老爷，到任来做澄海县，遇逢拜客樟林行。杨爷地理精万千，路游直入长发街，举首一望直过箭，顺途游过马路前。吩咐住轿出门来，抬头一看心内知，当面山形成火局，火煞迫近免疑猜。此街生成一烟筒，冬天一到火自红，不时定然遭火祸，为何无人识行藏。当时上桥游入城，和尚闻知来迎接，接入县主到大厅。杨爷下礼拜神明，和尚擂鼓共敲钟，拜毕进入后堂来，和尚进茶不迟停。樟林司爷一闻知，慌张也到武庙来，六社乡绅也尽到，礼毕坐下言东西。杨爷开口说一声：本县路过大街行，我观此街生火煞，切须料理快施行。众人听着喜冲天，大人明见无差迟，正是年年遭火难，一年一次真惨凄。大人有也可安排，好来示阮众人知，为民保得平安福，感载大人恩万千。杨爷开口再说言，若欲调理不艰难，市嘴建个火帝庙，可保合埠稳平安。杨爷说完就起行，摆道回返澄海城，众人听伊就料理，择日兴工庙建成。就刻帝君一金身，又刻一位是夫人，前面二位双太子，两旁太子加五身。吉日开光闹猜猜，好戏做有十外台，庙前搵斗打大敬，师公出来茂大狮。又与老爷祝寿辰，六月廿三帝君身，九月十五是帝君，庆祝圣寿事非轻。上好外江请二棚，每班两日共二夜，算来共凑有八厂，演戏一月日连夜。各厂备有大五牲，